

改革应该以什么为导向

有一种“改革没有共识”的担忧。我倒是觉得，改革是“有共识”的，那就是“必须改”。尤其是当前，民间是强烈呼吁改革，官方也很少有不谈改革的时候。即使既得利益者，也不好意思公开反对改革的。

如果说“改革共识”是指“怎么改”的共识，我觉得这有点难说了。相信任何时候都可能有一种官方和民间、利益群体和普通民众皆大欢喜的改革方案。不是说改革就是调整利益和权力的分配方式？利益和权力这两样东西，拥有的和没有的，合法拥有的和非法拥有的，态度不会一样。所以“怎么改”的共识不容易有。

回想“文革”结束时，中国是最有“改革共识”的。当时官民双方都觉得“必须改”，再不改，老百姓没饭吃。

到今天，中国又堆积了新的“改革共识”：社会矛盾“倒逼”得紧，底层感到被剥夺，利益阶层也感到不安全。各界都认识到，制度的深入改革，多少有点令人惊异的是，连官方都同意，目前改革的“最大阻力是既得利益阶层”。今天的改革和30年前的区别还在：30年前的改革，到处都可以作为“起点”，哪里开始都可以释放出能量；今天，当然，也是很多地方都需要改，但是，哪里都“不方便”先改。30年前，不知道改革的目的地，“摸石

头”

的同时就可以开始了；今天，似乎应该在国家战略的高度来构建改革。30年的改革过程，利益充当了实际的导向；今天，要破除不公正的利益格局，又能以什么为导向？

在这样的“攻坚阶段”，显然需要的是务实地面对具体的社会矛盾。可是奇怪的是，却有人又开始把“道路”和“主义”前置了。

道路和主义不是不重要，但它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问，有什么好的道路和主义是主张不监督官员权力，不要求官员公布财产，不尊重宪法和法律，不为弱者伸张正义……的吗？应该没有人好意思说有，说他要的就是这个。但是，却一定有人会绕来绕去地说，那是“汉奸”的主张，那不是中国的一套！然而，如果你承认那样的道路和主义是不好的，中国不需要那样，那么，就应该停止在那个方向滑行，就应该为不公正的、让人民失去权利的社会漏洞打上补丁。而这，就是改革！

改革必须是面向社会主要矛盾的，必须是以社会公正和人民权利为导向的，任何跟这个导向不兼容的主张，都应该一票否决。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17期 何三畏/文）

跪拜违背人性，其目的是通过仪式化的举动，贬低跪拜者的人格。对君主来说，三跪九叩的大礼就是要让臣民明白自己的身份是“低到尘埃里去的”，以此显示自己的权威。

在鸦片战争前，清朝君臣自认为是天朝上国，所有国家都是来朝贡的，所以外国使臣觐见时必须三跪九叩，否则不予接见。西方国家对此要求普遍反感，但为了经济利益，有些国家可以变通接受。

英国派出的两次使团及发生的礼仪之争耐人寻味。

一是1793年的马戛尔尼使团，中英双方就觐见时的跪拜礼节多次交涉。使团于8月11日到达天津，清廷官员在陪同前往北京途中就提出必须跪拜，英方当即拒绝；到通州后，再次提出，英方以不熟悉礼节推托，清廷官员当即示范，但英方拒绝学习。到城里后，清廷又派传教士去游说使团，英方拿出英国国王和王后的肖像，说如果他们按清廷要求行礼，清方也需派同级别官员先跪拜英国国王、王后像；之后，英国使团到承德热河行宫拜见乾隆，和珅多次派人交涉跪拜礼节问题，英方坚持不跪拜，只行单膝下跪的英式礼节，乾隆知道后，“朕心深为不快”，取消觐见活动，并下旨斥责英使“妄自骄矜”。

最后，双方算是见上面了，但英使到底三跪九叩了没有却是个疑问，中方文献说是跪拜了，英方材料说没有。

1816年英国再派阿美士德使团来华，清廷派出多位大臣试图说服英使行三跪九叩之礼，但被拒绝；嘉庆皇帝闻知大怒，拒绝召见，还说“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阿美士德使团只能无功而返。

鸦片战争后，清帝自知做不到让人下跪，又不能失去面子，于是采取避而不见的策略。这样一直拖到同治皇帝亲政，各国驻京公使要求觐见，面呈国书，被迫同意。同治接见各国公使，日本大使副岛种臣行三揖之礼，英、法、美、俄、荷等国公使行五鞠躬之礼。

这次接见，被安排在紫光阁。当时各国公使均不知清廷如此安排的“险恶”用心。紫光阁不在紫禁城内，而是在西苑，一般用于接见外藩属国贡使和蒙、藏王公。这意味着清廷仍将各国公使当作藩国使臣耍了一番。

现在来看，清廷的固守不让多属不必要，实质是对皇权尊严的竭力维护，而非真正出于国家利益。这也反映了儒家倡导的礼制，在历史实践演化为皇权专制的维护者，成为中国向现代转型的负面因素之一。

（摘自《新京报》5.26 洪振快/文）

当然，现在不仅官场、商场、职场都成了阴谋场。真正学了兵法去操练的人，毕竟是少数，多数人操练阴谋权术，凭的就是从电视剧里学来的那点功夫。无论现在大热的《甄嬛传》，还是《潜伏》，抑或古装剧《雍正王朝》，都是热衷阴谋的人们最好的课本。

热衷阴谋者，都希望自己是诸葛亮，别人是阿斗，找个机会，就把别人给玩了。殊不知，人人都练这门功夫的结果，就算是人人功夫都提高了，大家也只是依旧一般而已，你玩我一道，我玩你一道，大家扯平。其实，最大的可能，是人人都想当诸葛亮，最后却都是人都成了阿斗。

其实，阴谋流行的更大的恶果，还在于恶化了人与人的关系，既然没有人是好人，那么我们的敌人就会越来越多。看谁，都得提防。先是对手是敌人，然后同事也是敌人，最后发现朋友也靠不住，成为敌人的可能性更大。

人是群居动物，活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疯子和天才，都是需要朋友的。没有朋友，生活就太艰难，也太无趣了。每个人，都是天使和魔鬼的混合体，我们需要的是，把天使的一面发挥出来，而不是总是激发魔鬼的那一面。人可以争斗，也需要合作。发扬善，世界就美好，弘扬恶，世界就黑暗。一个黑暗，没有朋友的世界，谁能获利呢？

（摘自《学习时报》5.28 黎志敏/文）

（回）

毁人的成本有多低

体来说，无间断地质疑而又没有任何决定性的结果，除了让质疑者成为小丑之外，怕是没有其他任何效果。这样的

质疑只能毒化社会环境，进而提高社会互信成本。网友说

“质疑泛滥，使社会再次断裂”就是这个意思。当无善意、无

理由、无休止的质疑针对一个个体的时候，无论这个个体是什么人，最后都会走到

这个结果上。

另外，我倒是更想聊聊质疑的成本。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质疑政府或公职人员一般是没有什么成本的，最多付出一些研究的时间，而质疑一个个体则是需要付出成本的，他必须为自己一旦过分超过边界的质疑埋单，承担某些后果。但咱们这里正好相反，如果你质疑政府或者某些公职人员的作为，前有跨省之类的教训、后有“被精神病”的经验，往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很多人置之不理。总所周知，“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的话于脑后，致力于打击不同意见的少数。但对于个人的私域当中并不关乎大众利益的部分，不可随便质疑。其次是有力。质疑需要绝对有力的证据，而不能拿出随便什么渠道的消息就当做“铁证”，而一个“铁证”破产之后，对于自己已经碎了一地的节操以破釜沉舟的勇气，接着是四蹄蹬开，翻蹄亮掌地奔赴下一个“铁证”，这就不叫有力的质疑，而是耍赖。最后一个原则是有节。质疑只有针对掌握公共权力者才能不断进行，直到水落石出。但对于一个个

（摘自《南方都市报》5.24 五岳散人/文）

给陌生人一个微笑



1958年：村村有李白 人人会写诗



进”。文化部成立了全国文化大普及办公室，一些省、市、区也成立了文化卫星指挥部，开始大放“文艺卫星”。很多地方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甚至荒唐的口号和要求，诸如什么“两年就要超过鲁迅”，“一个夜晚写60个剧本”……

不少著名文艺家个人也制定了“跃进”指标，例如，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在《我的规划》中表示：下半年要“写一个大幕剧、两个独幕剧；每月写小品、评论一篇以上；写成《五四杂议》初稿；重温和精读《矛盾论》、《实践论》，做学习笔记……”并“保证完成，争取超额”。

放卫星：“歌声遍田野，壁画满山墙”

全民大办文艺的结果是短时间内涌现出许多的农民、工人作家、诗人，上海自称拥有70万人的文艺大军，成立了200个工人业余创作小组和1000个农民创作组。

清华作为一所理工为主的高等学校，此时成了著名的群众文艺创作的典型。全校1万多名学生，创作了5000多首诗，3000余首歌曲，1500个剧本，2000篇小说、散文、特写、曲艺，3000多幅漫画，办了700多种系和班级的油印刊物。

1958年文艺界所放“卫星”中，以当时开展的“新民歌运动”和“新壁画运动”最为引人注目。一时间，全国到处是“歌声遍田野，壁画满山墙”。

“新民歌运动”是在毛泽东倡导和支持下开展起来的。1958年3月23日的都会上，毛泽东指示要搜集民歌，他说：“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责，回去搜集一点民歌。各个阶层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看民歌不用费很多的脑力，比看李白、杜甫的诗舒服些。”

在领袖倡导、全民动员的情况下，“新民歌运动”迅速在全国掀起，开展得如火如荼。“跃进”歌声飞满天，歌成海洋诗成山。大白斗酒诗百篇，农民只需半袋烟。”“大跃进”时期的诗歌创作现象，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很多民歌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我来了》：“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龙王辞》：“自古水往低处流，谁

（短暂停顿）
由于文艺“大跃进”运动存在着诸多问题，作为文艺家、诗人的毛泽东也感受到了。1959年3月，毛泽东在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不能每个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叫每个人都写诗，比看李白、杜甫的诗舒服些。”

在领袖倡导、全民动员的情况下，“新民歌运动”迅速在全国掀起，开展得如火如荼。“跃进”歌声飞满天，歌成海洋诗成山。大白斗酒诗百篇，农民只需半袋烟。”“大跃进”时期的诗歌创作现象，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很多民歌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我来了》：“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龙王辞》：“自古水往低处流，谁

（综合《文史精华》徐秋梅 吴继金/文、《1958~1962年的中国知识界》罗平汉/著）

琐 忆

1944年8月8日，方先觉在衡阳苦撑47天，突围、自裁均失败后，为数千伤兵计，举旗投降（抗战中唯一投降的黄埔系将领）。几个月后，方先觉在军统衡阳站的接应下归回。1945年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喊杀方先觉之声不绝于耳。退到台湾后，方先是无处可躲，无地可辩护。1968年退役后，方先觉抱着蒋校长的膝盖痛哭，于蒋校长一声叹息中落发为僧。

1945年4月，西南联大学生准备纪念“五四运动”，国民党云南党部赶忙让昆明三家电影院赠送5月3日、4日2800张电影票给学生，以干扰破坏集会。地下党立即贴出“大字报”，称：免费票是国民党省党部用公款买的。于是有学生当场撕票，工学院学生还用数学公式加以说明：“电影票钱=一斤猪肉=大学生的灵魂！”吴晗则总结说，在意大利，墨索里尼曾对捕捉他的人说：“别杀我，我会给你一个国王。”在中国却是：“别开会，我会给你一张电影票。”

1918年5月20日，江苏江宁县进行众议员选举。全城公立学校停课一日，第一、第二两区投票所，有一群小学生奉命排队前往投票，从前门走进去，从后门走出来，然后再折回前门进去投票，如此反复循环多次。

（摘自《微历史》黄鹤/著）

那人

1979年，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应届毕业生黄帅接到了北京工业大学的新生录取通知书。理工科考生黄帅的成绩总分为322.5分，符合北京市规定的录取分数线。体格检查也符合录取条件。但是由于“四人帮”1973年曾利用当时年仅12岁的她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在教育战线制造混乱，这次是否录取她，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有些同志认为，不应该录取她，理由是：《一个小学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在教育战线造成的危害很大，她错误严重。另一些同志认为，应该录取她，理由是：“四人帮”利用《一个小学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事件，既破坏了教育，又坑害了学生，黄帅也是受害者。

面对黄帅的问题，当时担任中宣部领导的胡耀邦曾说：“黄帅考了320分，不录取，小孩子犯错误，能让她自己负责吗？有的同志就没有大眼光。黄帅如吸取教训，四五年后也可能不得。一个人有正反两方面经验，就很了不起。”1979年9月5日，黄帅跨进了北京工业大学的校门，开始了人生新的旅程。

1984年黄帅从北京工业大学毕业，1988年赴日留学，199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大学院，获硕士学位，1998年回国，供职于母校北京工业大学。（摘自《高考年轮·高考恢复30年》马国川、赵学勤/著）

那人

在上世纪50、60年代，甚至在80年代前期，杨朔（1913—1968年，山东蓬莱人，现当代著名作家、散文家）曾风靡大江南北。

解放战争时期，杨朔担任新华社战地记者，之后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到中国作协工作，1958年开始担任“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简称“和大”）主要领导。杨朔在“和大”期间曾被派往开罗常驻，任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书记处中国书记。“文革”开始后，“和大”所有驻外人员陆续调回北京“接受运动的考验”。原有领导干部一律“靠边站”，由造反派掌权。第一步就是把批斗对象隔离起来，军代表给每人成立“专案组”，进行“内部审查”，被隔离审查的大约有六七个人，杨朔也在其中。

据杨朔的养女杨渡说，当时给杨朔定的罪名是“丁（丁玲）陈（陈企霞）反党集团黑干将”，说他的《雪浪花》是给彭德怀翻案，《荔枝蜜》中

工蜂供奉蜂王是影射毛泽东。但这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罪证”。据杨朔的同事、著名历史学家资中筠回忆，杨朔并没有特殊历史问题，“文革”也没有点名批评他的某一篇文章。只不过因为杨朔是领导，又是作家，在那种特殊历史环境中必然会被揪出来。

资中筠记得，1968年7月底，在杨朔去世前不久，有一个自诩“根红苗正”的勤杂工，在院子里的地上用粉笔写了“打倒修正主义分子杨朔”几个大字。杨朔被送进隔离室之前看到了这几个字。在这之前，他还没有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这些字是军代表来了之后才出现的，所以杨朔可能以为这是军代表给他的定性的。他关进隔离室之后，曾递条子出来，要求与军代表谈话。军代表没有理会。谁知，杨朔就自杀了。

“杨朔比较迂，他太老实，太相信党，太认可军代表的权威。”资中筠说。（摘自《看历史》第2期 李杨/文）

那事

杨朔看到一行粉笔字后自杀

（摘自《微历史》黄鹤/著）

散叶

1988年6月11日，电影《血战台儿庄》在香港首映，万民争看，轰动香港。台湾“中央社”在香港的负责人谢忠侯在看完影片后，当晚就给蒋经国打电话说：“我刚才看了中共在香港上映的一部抗战影片，讲的是国军抗战打胜仗的，名叫《血战台儿庄》，里面出现了令人的形象，跟他们以前的影片形象不同，这次形象是正面的。”

在《血战台儿庄》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国民党师长王炳章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后，蒋介石亲自主持了追悼会。这时，天空上有日本侵华的战斗机飞来扫射轰炸。面对危险，蒋介石临危不乱，发表讲话，镇定自若。这场戏是根据历史档案拍摄的。而这个经典的镜头画面，与大陆此前反映蒋介石的影片，确实有着显著的不同。

蒋经国听说后，很是震惊，马上对谢忠侯说：“找一个拷贝来看看。”

于是，谢忠侯就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新华社立即报告了中共中央，并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于是，广西电影制片厂就复制了一盘录像带，通过新华社送给谢忠侯。谢忠侯马上带着《血战台儿庄》的录影带飞回台北。台湾方面收到拷贝后，宋美龄和蒋经国都很快地观看了《血战台儿庄》，并请国民党中常委的全体人员观看。

看完后，蒋经国说：“从这个影片看来，大陆已经承认我们抗战了。这个影片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看来，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有所调整，我们相应也要作些调整。”

不久后，蒋经国决定同意开放国民党部队老兵探亲，海峡两岸同胞在骨肉分离37年后，终于把苦苦的乡愁化作了喜悦的重逢，从而揭开了海峡两岸同胞互动往来的序幕。

那剧

《血战台儿庄》让蒋经国同意老兵回大陆探亲

（摘自《人民政协报》顾育豹/文）

血战台儿庄

让蒋经国同意老兵回大陆探亲